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反科学主义思潮下 中国现代史学的人文指向

——以“东南学派”为中心

张秀丽/著

The Humanism Side of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under the
Trend of Anti-scientism: Use the Southeast School as example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反科学主义思潮下 中国现代史学的人文指向

——以“东南学派”为中心

The Humanism Side of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under the
Trend of Anti-scientism: Use the Southeast School as example

张秀丽/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科学主义思潮下中国现代史学的人文指向/张秀丽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 1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5112-0984-9

I. ①反… II. ①张… III. ①史学—研究—中国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1205 号

反科学主义思潮下中国现代史学的人文指向

作 者: 张秀丽 著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武 宁

责任编辑: 刘书永 苑 琛

封面设计: 小宝工作室

责任校对: 邹皓丹 王才友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 (原崇文区) 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5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本: 690×975 毫米 1/16

字数: 228 千字

印张: 13

版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12-0984-9

定价: 32.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 录

引 言 重寻史学的人文属性 / 1

- 一、问题的提出：人文主义史学的价值所在 / 1
- 二、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7
- 三、对既有研究的思考与相关界定 / 11

第一章 科学主义大势下的人文潜流 / 16

第一节 科学主义思潮与中国现代史学上的科学化史学 / 16

- 一、科学的泛化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并兴 / 16
- 二、科学化史学的产生及面临的困境 / 26

第二节 反科学主义思潮与中国现代史学上的人文主义史学 / 39

- 一、一战后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 / 39
- 二、对科学化史学的反思及人文主义史学的兴起 / 45

第三节 人文主义史学的整体面貌 / 50

- 一、国粹学派对传统人文的强调 / 50
- 二、“东南学派”对人文主义史学的发掘 / 55
- 三、新儒家对人文主义史学的继承与弘扬 / 60



第二章 人文主义史学的基本阵营：“东南学派” / 66

第一节 “东南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 66

一、“东南学派”的酝酿和发端 / 67

二、南高在学术社会中的地位 / 71

第二节 柳门师生与“东南学派”的学术阵地 / 79

一、“东南学派”的主力：柳门师生 / 79

二、“东南学派”的基本学术阵地 / 87

第三节 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学术交锋 / 95

一、“实验主义”的挑战者 / 95

二、“古史辨派”的挑战者 / 105

三、“史语所派”的挑战者 / 114

第三章 人文主义史学在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地位 / 122

第一节 人文主义史学兴起的理路 / 122

一、传统史学的内在延续 / 122

二、西方新人文主义史学与生命哲学的外在导引 / 129

三、民族危机下的时代诉求 / 137

第二节 人文主义史学的特点 / 143

一、对通史的注重 / 144

二、对史学经世功能的肯定 / 151

三、对特殊性的强调 / 156

第三节 人文主义史学的成就与局限 / 162

一、人文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就 / 163

二、人文主义史学存在的局限 / 178

结语：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人文主义史学的价值重估 / 183

参考文献 / 190



引言

重寻史学的人文属性

一、问题的提出：人文主义史学的价值所在

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存在一个若隐若现、似淡却浓的“东南学派”，这一学派以其创办的学术期刊穿针引线，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有机联系起来，在科学化史学主流之外形成了一个有别于主流史学的人文主义史学流派。他们有固定的作者群，有忠实的读者群，有基本的学术阵地，有相同的学术理想和治史理念，有共同的信仰，以倡导 20 世纪的人文主义史学为宏伟目标，并前后坚持了很多年。这一学派并没有统一的组织，我们将之称为一个学派或有不妥之处，为了行文的方便姑且如此称呼。该学派在科学时代高扬人文主义旗帜，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其灵魂人物为柳诒徵，而柳门弟子则是此派的主力军，他们以具有相同学术理念的《学衡》《史地学报》《史学与地学》《史学杂志》《国风》《思想与时代》等刊物为坚强有力的学术阵地，坚持对人文主义史学的发掘和弘扬。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他们既反对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又反对盲目排外；不仅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发掘传统文明中蕴含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且吸收介绍西学新知，将之融汇到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于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具有深厚人文传统的国度，尊德性的儒家学说一直都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中西、新旧文化的交融过程中，传统文化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东南学派”是在 20 世纪初新一轮的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所产生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一部分对传统文化具有浓厚感情的知识分子，从传统文化中发掘人文因素，并借鉴西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对传统文化做出重新估价的同时，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观念、史学价



值观念、历史观、史学与哲学等方面都做了有益的探讨，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 世纪初期是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在变革转换的特殊时期，新与旧、中与西、古与今以及学术与政治之间盘枝错节交互缠绕，使得这一时期的史学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在逐渐深入的研究过程中，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进程已经得到了史家的一致肯定，而人文主义史学虽然在史学领域有一定的建树，却一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有意的忽略或忽视，这与“东南学派”所实际取得的成就极不相称。

20 世纪初北方代表学术界的主流，所以学者多侧重与民主、科学主题相关的正面研究，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论述也是以北方学术界展开的，南方学术界仅仅被当作陪衬偶尔被述及，这就造成了南方学术研究的缺失以及南北学术交流的严重欠缺。因此，长期以来，作为一个松散的学术团体，作为唯一一个可以与北京大学相对抗的南方学术重镇“东南学派”就少有人论及，甚至被当作保守、反动、落伍的对象加以批判，更谈不上专门的研究了。《学衡》杂志自创刊之日起就被鲁迅不客气地衡了一衡，认为他们不过是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而胡适也认为《学衡》不过是在新文化运动已经取得绝对胜利的时候所迟来的批评。对于《史地学报》等一系列同人杂志，新文化运动者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双方也只是就疑古与古史问题进行了正面交锋。顾颉刚等人将柳诒徵作为“信而好古”的代表，指出“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的。”^①至于标榜“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与时代》，胡适对其评价也不高，以为“此中很少好文字”，并认为“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②由于《学衡》与《史地学报》等以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姿态出现，所以自开始就被纳入了保守主义的范畴，并与现代化思潮并提，且背负着这个包袱过了大半个世纪，人文主义史学自然没有

① 罗根泽编：《古史辨》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 页。

②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 7（1938~1949）》，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39 页。



受到应有的研究。

在学者绘制的中国现代史学的版图中，科学化史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人文主义史学始终处于不在场或缺席的状态。在中国现代史学史叙事中，不是史料学派占据主流地位，就是史观学派占据主流地位。“文革”以后，学者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叙述多能兼及先后占据史界主流的两大史学流派，并将之归入科学化史学的历程。余英时指出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先后曾出现过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有两派：一为史料学派，以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一为史观学派，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①余氏以为，“就思想的渊源言，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分别代表了近代史学追求科学化的两个途径。”^②

许冠三将在西学笼罩下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向视为科学化的进程。他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指出，“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尽管“各派的宗主虽各有所偏，或重方法，或贵材料，或尊理论，但彼此对立之情况，实与其历史形象相去甚远。如经济史观派与史料学派，从表面看貌似南北两极，实则均因国人的科学迷恋而兴，并齐以‘科学的史学’相标榜。”^③

王晴佳则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发生了向科学化史学的重要转变：一是对史料进行谨慎的批判，力求写出所谓的“信史”，成为“客观的”或“批判的”史学；二是对历史的演变作一解释，寻求一种规律性的东西。^④实际上即指胡、顾、傅等人的历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这两种学术类型。

朱发建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一书中指出，20世纪的中国史学虽然史家辈出、流派纷呈，但全都笼罩在“科学文化”及“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各家各派都开始了其“科学化”的行程。^⑤20世纪20年

① 余英时：《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页。

②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③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前言》上册，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

④ 王晴佳：《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钱伯城、李国章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6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⑤ 朱发建：《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绪论》，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代中国史学界倡导“科学化”的学者大致为两派，即“科学实证派”与“科学史观派”。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的“科学化”已是一种趋势，尤其在“科学万能”观念的支配下，人文社会科学争相向自然科学看齐。自然科学的普遍有效性使人们相信，只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论，社会科学研究就可以跻身而为“科学”。罗志田曾指出：“思想学术的泛科学化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显著特征。”^① 侯云灏也指出，“科学化始终是20世纪中国史学家追求的目标，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② 近代史学在这一趋势的影响下也卷入了科学化的过程。在晚清时期，史学虽然已经到了转型的边界，但发展方向还不是很确定，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促使史学在摆脱了传统经学的束缚之后，迅速投入到科学的怀抱。在声势浩大的科学主义思潮下，中国现代史学在历史观、治史方法、史料观、治史态度与精神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五四时期，科学化史学也表现出多层次性，一种是以胡适、顾颉刚及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史料学派，以科学方法以及自然科学研究的手段，主要是对史料进行发掘整理和对事实本身的求证。一种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唯物史观派，通过对唯物史观的译介和传入，以寻求历史规律为基点推进史学的科学化进程。^③

从各位学者所划分的史学派别可以看出，进入史家视野的基本上是先后占据学界主流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研究界或者偏向史料学派的叙述，或者偏向史观学派的叙述。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叙事中呈现出不是史料学派占上风，就是史观学派占上风这样一个此起彼伏的状态，而史学中其他支流则几乎完全湮没不彰。能够做到客观叙事的史家大多也是将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共同作为

① 罗志田：《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五四时期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23页。

② 侯云灏：《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自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 当然，这两种科学化史学之间也存在具体的差异。史料学派强调的是科学方法和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注重以科学方法阐发史料；史观学派注重从认识对象中阐发历史发展的规律，注重以科学理论解释历史现象。在史料学派看来，史学之所以为史学，并不取决于所研究的对象，大至天文地理，小至一虫一草，只要能用科学方法说明并加以研究的，就都能成为科学。史观学派所界定的科学的史学主要以能从历史研究的对象中发现“公理公例”的客观规律为准则。



20 世纪学术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①然而，细加考察我们发现，史学的科学化只是中国现代史学的主流趋势，并不能代表 20 世纪史学的整体面貌。在反科学主义思潮下，诞生了中国现代的人文主义史学，作为处于边缘地带的非主流史学，长期没有被纳入中国现代史学叙述的框架。过去我们强调最多、研究最多的就是作为科学化史学的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而对于非科学化史学却很少给予关注，如果提及也只是作为反动保守的一面给予批判。我们知道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都曾经走向极端，为了史学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兼收并蓄，从各家各派中汲取有利于发展的建议和史学设想，这样我们在当今的史学建设中才不会走低级的重复的建设路线，才能够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总而言之，对于如何看待 20 世纪上半期的史学版图，科学化史学之外是否存在一个人文主义史学的流派，人文主义史家为其所信奉的理念究竟做了怎样的努力，究竟如何在传统人文与现代科学之间做出抉择，人文主义史家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这是本文所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人文主义史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不占据主流地位，但并不代表没有可以借鉴的意义。重新发掘中国现代史学中的人文因素，不论是对于全面了解中国现代史学的整体状况，还是对于当代史学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史学的长远发展来看，人文主义史学对于丰富中国现代史学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建设意义，并为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合理的内核。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史料派与史观派各趋一端，最终形成了尖锐的对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陈寅恪形象的重新活跃史坛以及郭沫若形象的淡出，史料学派重新走入中心视野，近今史学仍不脱非此即彼的流弊。在史学发展面临诸多歧路的今天，在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强悍的冲击下，我们应该如何在围障重重的枷锁中突出重围，如何寻求史学从今而后的健康发展，便成为学者首要的考虑因素，而对处于非主流地位的人文主义史学的考察则为这种思考提供了一种可能。

^① 王学典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一文中指出对于 20 世纪中国史学史叙述总的来说，在 1949 年以前基本是以史料考订派为中心的叙事；1949 年以后基本是唯物史观派为中心的叙事。而 1990 年代以来，学术史叙事则总体向史料考订派倾斜。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2 期。对此余英时也指出：“1919 年五四运动以来，随着科学主义的兴起，实证主义更加紧紧抓住中国历史的心。……1919 和 1949 年间，中国史学主流的主要影响力，是由胡适和傅斯年大力提倡所谓‘科学的历史’，而 1949 年起，中国历史研究就已经完全地受马克思主义模式的支配。”余英时：《历史女神的新文化动向与亚洲传统的再发现》，《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2 页。



在 20 世纪上半期的人文主义史学中，由于各自的家学渊源、外来的理论支撑等方面的不同，也表现出了多种不同的治学路径。除了“东南学派”主要凭借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科学化史学进行质疑、反思之外，还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人文主义史学：一为传统史家对人文传统的强调，一为现代新儒家对人文主义史学的继承与弘扬。前者以国粹学派为代表，除了接受西学的影响外，主要从传统史学里发掘出反思科学化史学的资源；后者以新儒家为代表，在外缘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同时，发掘了传统经学中宋明理学中的心性、义理之学来反对植根于乾嘉考据形态的新汉学。这三种不同形态的治史路径构成了 20 世纪上半期人文主义史学的整体面貌，而在这三者之中，又以“东南学派”的人文主义史学最具代表性，且在这三者中起承前启后的作用。

“东南学派”不仅网罗了一批留学欧美的新型知识分子，还与国粹学派和南社等传统知识分子有密切的联系。郑师渠曾指出前者与后者之间有直接的“师友之谊”，“学衡派多为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梅光迪更早在 1915 年即有诗作在《南社集》发表，二人后且列籍‘南社’会员。而原《国粹学报》主笔及‘南社’的主要发起人陈去病，也正‘主教东南大学’。特别是吴宓，还在《国粹学报》时代即崇拜黄节的诗，后更成其入室弟子，故《学衡》刊黄节诗最多。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学衡派毫不隐讳自己承国粹派的余绪，而以新一代的国粹派自居。《学衡》杂志标明自己的宗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高揭的同样是保存国粹的旗帜。吴宓说，‘为保国保种之计’，尤须保存国粹，‘如是则国粹不失，欧化亦成，所谓造成新文化融合东西两大文化的奇功，或可企致。‘学衡’派倡言国粹，一头连着白璧德，另一头连着黄节、陈去病，本身就极具象征性，说明国粹派的文化思想与现代保守主义是怎样的一脉相通。”^①“东南学派”与国粹派之间是交互影响的关系，由国粹派开启的文化思路演进到“东南学派”，并向纵深层次继续发展。两派学人不仅互有交往，还在共同面对科学主义者时结成有力的统一战线，章太炎与柳诒徵之间的学术交流即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关联。

《学衡》杂志为新儒学的发展在客观上做了较为重要的准备。这种准备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传统的思想来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下一个

^①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3 页。



阶段就是从西方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来重新审视儒学的现代价值，从而对儒学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整理。东方文化拯世救国论，极大促进了新儒家日后形成生机主义宇宙观与直觉主义认识论的哲学体系。^① 柳诒徵又为现代儒学的宗师。他认为，儒家经典“《诗》《书》《礼》《乐》，皆史也，皆载前人之经验而表示其得失以为经验者之先导也”；另一面，中国史学通贯儒学，儒学精神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核心。柳诒徵发表论著，对孔教正本清源，指出了儒学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以孔教拯救现代社会，“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侪对于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② 以柳诒徵为南雍双柱之一的南京大学，是现代儒学复兴的策源地；以其为国学支柱的学衡派，成为后世新儒家的学术滥觞，因此新儒家的宗旨与“东南学派”又是前后一贯的。所以在人文主义史学的论述中，本文选取“东南学派”重点介绍，对20世纪初的人文主义史学进行初步考察，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

二、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清末民初的中国史学在摆脱传统经学的束缚之后，既有走向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又有西方科学的外在导引，因此，中国现代史学在20世纪走上科学化是必然的道路。在这一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对科学化史学的反省和批判。这种思考既有来自科学化阵营内部的不同观点，也有来自人文主义史学阵营的批判的声音。同一阵营的批评以梁启超、何炳松、朱谦之、雷海宗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不同意见为代表；人文主义阵营的批评以张荫麟、钱穆等人对史学学科性质的不同理解为代表。以章太炎厕身其中的国粹学派、以柳诒徵为核心的“东南学派”以及以钱穆文化史学为典型代表的新儒家，在发掘传统史学人文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合理成分，发起了科学化主流之外的一场史学领域的人文主义运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表达了对科学化史学弊病的反省和对史学人文层面的肯定与弘扬。此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取代史料学派成为史界主流，人们相信历史学就是一门科

① 卜祥记：《哲海探航》，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870页。



学，而且是唯一的一门科学，至此，对史学科学性的讨论逐渐冷却下来。直到80年代，随着中国文化领域人文研究的展开与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史学客观性的挑战及对史家主体的强调，史学的人文层面重新又纳入人们的视野，一方面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科学化史学所存在的弊病，另一方面学者也开始注意从正面阐述史学的人文价值。

中国文化之人文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庞朴先生最早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应该是人文主义，并从九个方面对中西人文主义进行对比，指出中国是重视人伦、重视世俗生活、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国度。^① 庞先生的文章立刻引起了人们讨论的兴趣，纷纷加入了这一探讨，由此学界展开了对人文精神的界定、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以及与西方人文精神的异同等问题的比较讨论。80年代曾就此召开了多次讨论会，《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还特辟专栏进行了集中讨论。

与此同时，学界围绕着“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史学界开始关注史学科学属性之外的人文属性，并注意了史学的非科学特征，朱本源、李桂海、何兆武、庞朴、王少卿、李洪岩、朱卫斌、刘爽、周振鹤等人重提史学的艺术特征，发掘历史著作语言的美学特点并倡导客观历史的审美功能。朱本源呼吁必须注意史学的艺术特征，主张只有将科学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完美的史学。^② 李桂海重提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指出历史学家在坚持历史的科学性的同时又应当具有艺术家的创造精神，力求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起来，唯其如此才能促进历史科学的飞速发展。^③ 李洪岩主张历史学是“科学与人文学的统一”，既不同意将历史学完全等同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主张，又反对将历史学同人文学等视的观点。^④ 朱卫斌试图调和科学与人文，在承认史学科学性的前提下肯定了艺术对史学具有的影响。指出就学科个性而言历史学是一门科学，遵循着从事实中得出结论，引出规律的研究途径；就表现形式而言，艺术对史学有重

① 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论纲）》，《光明日报》1986年1月6号。

② 朱本源：《漫谈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6年第3期。

③ 李桂海：《历史学家也要有艺术家的创新精神》，《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3期。此外，李桂海在1994年《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一文中重申了这一观点。

④ 李洪岩：《历史学：科学与人文学的统一》，《江汉论坛》1993年第2期。



大影响。^① 赵兴彬上承 20 世纪上半期史家关于“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对史学的根本属性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指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对立统一。^② 王学典先生在对 20 世纪的百年史学特征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指出历史学既不完全是史料考订派拿证据来的实证科学，也不完全是史观学派探求规律的法则科学，而是一门具有科学属性的解释学，史料考证与历史阐释都是史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历史学要想保持自己的固有性质就绝不可能把自己还原为一门科学。^③ 在这场“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论争中，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强调“历史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的看法，他们不再简单地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纯粹的科学，至少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严格的科学。他们或者注重史学的艺术功能，或者强调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或者主张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对史学的人文层面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20 世纪 90 年代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讨论，以老一辈史学家何兆武和庞卓恒对史学科学性问题进行的论争最具代表性。何兆武先生对历史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其部分重要成果已经结集为《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出版，对于历史学研究对象的特性、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学科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在《史学理论研究》1996 年第 2 期发表了《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试图对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以及多大程度上是科学这一问题进行初步阐释，强调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认为历史学是一种人文知识，而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此文刊出以后，庞卓恒在《史学理论研究》1997 年第 3 期刊出了《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与何兆武先生商榷》一文，就史学学科性质问题与何兆武进行了商榷，他坚决捍卫史学的科学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即是科学且是唯一的一门科学，指出历史学的科学性主要不是体现在历史学的第一个层面上即对史料的认定上，而是体现在第二个层面上即对史实的解释和理解上，并对何兆武关于史学是一种人文知识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引发了史界人士的普遍关注，使得史学学科性质的问题有了进一步解决的可能。

关于“叙述”在历史学中所占地位的问题所引发的论争主要体现在王学

① 朱卫斌：《历史学：科学还是艺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4 期，第 74 页。

② 赵兴彬：《历史学的本质特征：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泰安师专学报》1996 年第 4 期，第 433 页。

③ 王学典：《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文史哲》1997 年第 6 期，第 20 页。



典先生《历史是怎样被叙述的——论历史知识的人文主义属性》一文中,王先生指出,围绕着“历史是叙述还是分析”所发生的碰撞实质上是“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论争的继续。推崇“分析”者认为历史知识是科学知识,强调叙述者则认为历史知识是“艺术”知识。在分析比较二者的基础上,王先生对历史知识的性质尤其是史学的人文属性问题进行了论述,重申“历史学是一门具有部分科学属性的解释学”。^①

进入21世纪,史家继续关注历史学学科属性中的人文性问题。舒晓昀在肯定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基础上,指出历史学又具有自己的学科个性,仅凭自然科学的方法是无法解释历史的。^②周振鹤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入手,指出历史学就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而言兼具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特征,因而历史学呈现出对象的人文性与方法的科学性并存的现象。^③邹兆辰强调史学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这是我们需要继承的,且需要使这种传统上升为具有当代特色的人文关怀力量。^④武吉庆特别提出人文关怀是史学研究的题中之义,而要发掘人文精神的这种潜力就必须强化史家的主体意识。^⑤叶文宪也指出历史学是兼具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两种性质的一门学科。^⑥与此同时,史家纷纷对上个世纪关于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进行了总结,黄敏兰对上个世纪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探讨给予了整体关注。^⑦徐兆仁也总结了关于历史学学科性质问题的18种观点。^⑧

此外,除了关心史学学科本身所具有的人文属性之外,新时期的学者还开始关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人文主义史学面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逢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关于现代史学建设路

① 王学典:《历史是怎样被叙述的?——论历史知识的人文主义属性》,收入王文章,侯祥祥《中国学者心中的科学·人文(人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0页。

② 舒晓昀:《历史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第116页。

③ 周振鹤:《历史学: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41页。

④ 邹兆辰:《史学的人文传统与当代史学的人文关怀》,《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46页。

⑤ 武吉庆:《人文关怀与史学研究主体意识》,《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第126页。

⑥ 叶文宪:《历史学是科学还是人文》,《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5期,第21页。

⑦ 黄敏兰:《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性质的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第88~97页。

⑧ 徐兆仁:《历史学学科性质问题论略》,《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5期,第7~13页。



向的一点思索》一文中已经注意到了20世纪历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两重治学路向，一是自然科学化史学与社会科学化史学，代表了史学科学化路向；一是钟情于人文主义的史学，代表了人文倾向的治史路向；并简要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及特征做了总结，可惜没有详细展开讨论。^①

在论著方面，张书学探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指出这一思潮是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占据主流的实证主义史学的反动。与实证主义史学相反，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强调史学的主观性，重视理论的探讨和史观的重建，倡导史学的实用性。^②

较早系统介绍20世纪人文主义史学的以台湾学者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一文为代表，此文主要考察了20世纪20至30年代民国史学的发展趋向，大略分为新旧二派，新派主要指从胡适到顾颉刚、傅斯年的主流史学，而传统派主要是以东南大学为代表，此文在揭示两派治史旨趣及具体操作方法上的异同方面不乏精义。但其重点放在了对科学化史学的介绍和评介上，在揭示科学化史学弊病的同时附带对南高的批评言论给予了关注，论述稍嫌简略。^③

在王汎森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深入探讨的是朱发建，他较为系统的考察了近代史家对科学化史学的反省，在时间断限和考查对象上都较王文有所扩大。其《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有一章专门探讨了史学科学化的困惑及其新趋向，涉及章太炎、学衡派、新宋学派对科学化史学偏弊的批评和反省，对于本文的写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仍旧是作为科学化史学的附属部分进行论断，并没有能够充分展开。^④

三、对既有研究的思考与相关界定

总结20世纪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整体状况，我们发现既有研究呈现这样几个特点：

1. 纵观20世纪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我们发现进入史家视野的主要是先

① 胡逢祥：《科学与人文之间——关于现代史学建设路向的一点思索》，《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第113页。

② 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参见《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 朱发建：《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后占据史界主流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等科学化史学，或者偏向史料学派的叙述，或者偏向史观学派的叙述。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叙事中不是史料学派占上风，就是史观学派占上风这样一个此起彼伏的状态，而史学中其他支流则几乎完全被湮没。能够做到客观叙事的史家大多也是将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共同作为20世纪学术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细加考察我们发现，史学的科学化只是中国现代史学的主流趋势，并不能代表20世纪史学的整体面貌。在反科学主义思潮下，诞生了中国现代的人文主义史学，作为处于边缘地带的非主流史学，长期没有被纳入中国现代史学叙述的框架。

2.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承认历史学学科科学性的基础上，学术界开始注意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具有的特点和个性。在“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中，越来越多的史家承认史学具有人文性，主张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但是，学界对史学人文性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历史学学科属性的探讨上，对于20世纪上半期史学的整体面相仍缺少关照，只有少数的几个学者注意了现代史学史上的这一人文主义史学倾向并给予了相关研究，因此，20世纪初期的人文主义史学仍有待于我们进行深入地发掘和整理。

3. 史学界对人文主义史学所涉及的个别人物或作为相关学术阵地的期刊与杂志已有了具体研究和论述，如学界对《学衡》杂志以及“学衡派”、《史地学报》、《思想与时代》等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多是作为个案零散的考察，进行系统探讨的不多，而能够注意到《史地学报》与《学衡》渊源关系的更是寥寥无几，至今尚没有人系统梳理20世纪这场发端于《学衡》的人文主义运动。

4. 自20世纪80年代学界开始注重史学的人文属性，但在倡导人文性的同时有过分拔高的倾向，我们在纠正史学过分科学化倾向的同时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史学科学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偏弊，但不应该因此抹杀了史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20世纪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倾向是大势所趋，是中国现代史学的主要特征，其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容抹杀的。我们发掘20世纪史学人文价值的层面是要促进史学在新时期的健康发展，并非是要弘扬其中的一方，而贬斥另一方，如果这样，我们的探讨就没有意义了。

此外，史学界对于史学科学化进程已经做了比较详备的研究，但对于史学领域存在的反科学主义倾向未加系统梳理。一些专著和论文已经涉及了相关部分，并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像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探讨，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